



“该死的奥数”系列报道之九

本报奥数报道引强烈社会反响

主管部门首肯：整治从未放松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奥数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直比较明确，几乎在每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中，我们都明确规定严禁将包括奥数在内的各种竞赛成绩作为入学依据。”7月26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市教委的官员这样表示。

早在2003年，北京市教委便作出了类似规定，但时至今日，在部分学校招生部门的眼中，奥数成绩依然是决定学生是否被录取的重要判断依据。这也是奥数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教委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目前北京市遵循的就是就近入学原则。因此，从政策上讲，并不存在重点校和非重点校之分。但所谓“好学校”的概念在家长意识里已根深蒂固，而且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学生在选择学校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倾向性。“奥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教育资源的均衡。我们也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该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教育部对包括整治奥数在内的中小学生学习减负问题早有明确规定，11年前就已明令禁止奥数与升学挂钩。

在记者7月26日辗转获得的对全国政协去年的一份相关提案的答复中，教育部再次重申，“不得将各类考试和竞赛成绩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并列举了各地“针对普遍存在的‘奥数热’现象”所采取的整治工作，其中，成都市规定，教师校外兼职教奥数或私办奥数班将被严惩甚至开除；公办学校以奥数成绩选拔学生，校长最重可“撤职”。其打压奥数功利倾向的态度十分明朗。

社会名人支持：奥数已走火入魔

本报记者 潘希 麻晓东 冯丽妃
见习记者 孙爱民

“我非常支持你们的报道，希望你们可以顶住压力，做出好的报道。”正在欧洲出差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接到《中国科学报》记者电话时，如此答复。

冯骥才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现在的教育却大大限制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现在的教育已经不仅仅是负担的问题，而是已经逐渐造成孩子心灵的畸形，是他们的心灵禁锢。”

“奥数培训班铺天盖地，家长也越

来越实际。其实还是要让孩子自由发展，如果没有天赋，千万不要硬让他去学。”一级作家、著名科普文艺作家叶永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国互动媒体集团总裁、《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洪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用了她独特风格的语言：“现在，奥数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在洪晃看来，坚决不能“把科学弄得跟邪教似的，把教育弄得跟真人秀似的”。

其实，叶永烈的儿子曾在奥数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最终成为一家大公

司的软件工程师。“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奥数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会和升学挂钩，直到高考前才知道可以保送入学。”但叶永烈仍然认为，奥数不应该成为众多学生求学路上的“路障”。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跟同事聊孩子的事情时，从来都不谈奥数的话题，“我们聊孩子，都是聊幸福与快乐的事”。崔永元的孩子没上过奥数，“像一些重点学校，公开或是偷偷地把奥数成绩与升学直接挂钩，那实际上就是暗示：不学不行，非学不可。这样我们就得探讨一下奥数对孩子有什么作用了”。

“如果一个孩子梦想的职业生涯是开卡车或者当画家，而奥数影响了他上好学校，那就相当的惨无人道了。”崔

永元认为，如果教育部规定奥数必须学，那就应该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摆到桌面上；如果教育部门不是这样理解的，并不是每个人非学不可，那就不应该把它和升学挂钩，“这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

“如果奥数关系一个人的前途，那么我可能一点戏都没有，我连奥数都不行，更别提奥数了。”崔永元表示。

“孩子是个人，是一个个的人，教育必须尊重他们，爱惜他们。这不仅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更是对孩子的心灵负责。”冯骥才言辞犀利，“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也到了全体知识界共同讨论的时刻，教育部门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院士专家声援：支持正义报道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李晨

“看到你们的系列报道‘该死的奥数’，很高兴。”中科院院士李邦河在致本报的信中说，两年多来，他在全国政协一直在为中小学习减负努力，2011年提案的理论部分，就曾发表于去年4月15日的《中国科学报》。“看到你们反奥数的决心如此之大，很高兴，因为媒体的威力有时大过政协提案。但媒体如与政协提案结合，则威力更大。”他在信中表示。

“我支持你们的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用奥数作为小升初的选拔手段，这当然是极其愚蠢的做法。有些孩子小学还没有学懂数学，怎么考试？难道他们就是笨孩子了吗？小学生学奥数都太早了，初中后期开始学还可以。”

他表示我国应试制度应向法国学习。“美国的教育体系不以考试手段来选拔人才，所以中国基本无法借鉴，而法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考试，但是他们比我们考得高明。”张寿武说，“法国最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每年只录取少数顶尖人才，而所有优秀人才都是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

“我反对奥数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开门见山地说。据他说，奥数在武汉同样“横行无忌”，他正在上小学的孙女为了考取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也在学奥数。

他认为，通过奥数考试选拔学生的教育方式正在走“歪路”，在应试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奥数并不能让孩子真正发展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如果我们每一代都搞应试教育，我们如何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新一代还有什么个性科研？我们如何创新？”他质问道，“这是我们民族发展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打破的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兴田认为，小学生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而，现在很多小学生为了考个好中学，把童年时间都泡在奥数里，丧失了全面发展的空间。

“我国原始创新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广泛培养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全面发展，仅仅‘死念书、念死书’，我国创新仍将难以超越别的国家。”舒兴田说，“孩子们不应该在每个星期天与节假日都像机器人一样地学习再学习，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还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家长共鸣：何时不为奥数纠结

本报记者 张巧玲

“我们终于过了这一关了！”再次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雯(化名)心情显得轻松多了，孩子已顺利通过“小升初”，他们不用再为奥数纠结。

“你们的报道应该能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李雯说，因为《中国科学报》的报道，奥数问题正引起身边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李雯告诉记者，每个家长在送孩子上学之前都有各种憧憬，然而，进入校门和社会后都会变得不由自主：“送孩子去学奥数是不不得已的‘妥协’。”

相比之下，黄女士和冯先生更加无奈，他们都是来北京的普通打工族，每年却不得不拿出4000多元钱送孩子上奥数班。

“听‘过来人’说，‘小升初’的考试

题里有奥数内容，我们不得不给孩子提前作准备。”黄女士说。然而令她困惑的是，虽然自己的孩子已经上了一年半的奥数班，但由于奥数题跟学校里学的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对孩子平时成绩的提升几乎没有帮助。

冯先生的孩子现在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却已上了两年奥数班。然而，一个年级几百个学生中，真正能对奥数表现出兴趣的学生寥寥无几。“如果老师说有事暂停一次课，孩子们都会很高兴。”

学奥数，孩子累，家长心疼，但家长更多的是无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雯想到更多的是，由奥数引发的对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失望和担忧。她表示，如果《中国科学报》的这组报道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真正在促进奥数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将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媒体齐声赞同：报道代表良知

本报记者 彭科峰

事实上，有关奥数的批评和指责性报道已持续多年，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华商报》等各大媒体近年来也做了大量有关“根治奥数班”的报道。而针对本报此次推出的“该死的奥数”系列报道，多家媒体同行纷纷给予好评，认为代表了舆论界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尽管在7月26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表示自己的孩子还没到上奥数班的年龄，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奥数问

题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

张泉灵去年8月份就在央视《新闻1+1》栏目主持过一期讨论如何根治奥数班的节目。她在节目中直言，奥数早已被各种各样的专家证实，它是一种让少数人赚钱得利，让家长赔钱赔时间，让孩子失去童年，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笨蛋的项目。在根治奥数班的对策方面，张泉灵表示，要衡量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到底有没有真正地“出硬招儿”来管住奥数班，“不看他们打”了多少奥数班，要看他们有没有掐断利益链，名校有没有招奥数班的学生”。

新华社一位教育领域记者向《中国科学报》表

示，事实上，奥数及其背后的利益链问题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各地社也陆续做过有关奥数的报道。他人为政府下决心斩断奥数背后的利益链；而媒体的报道，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与本报不谋而合的是，《广州日报》也在最近发出一篇批评奥数的报道。7月3日，该报一篇题为《“奥数”，人类已经无法阻止你疯狂》的报道指出，奥数陷入功利怪圈，是屡禁不止、高烧不退的重要原因。要涤荡害人的奥数，当从考题开始，哪怕是民办初中考试，也要对超出小学年龄段孩子接受能力的奥数题坚决说“不”。

科学时评

如何遏制违法用地冲动

田方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副局长岳晓武表示，上半年违法用地呈现“两降一升”态势，6月份发现违法用地面积约占上半年的三成，下半年违法违规反弹压力加大。(7月26日《证券时报》)

据报道，包括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在内的土地收入，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同时，违法用地“成本低廉”，诱使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堂而皇之”的理由，从违规使用土地中得到利益。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违法问题，一是改变当前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主体的现状。放眼全球，土地财政并非中国独有，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政府一级的财政收入七成都是靠土地税收，但这些税收主要来自土地保有环节而非出让环节。

二是治乱必须用重典。31个县(市、区)，73名地方官员——这是首轮土地问责结果“黑名单”中的关键数据。今年上半年，又有185名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82名责任人受到政纪处分，46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冀望这些处分和问责落到实处，使违法用地切实得到遏制。

院所访谈

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

科技创新助农业转型跨越

本报记者 程春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业科技，明确“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的主题。与此同时，山西省出台相关文件，咬定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将农业科技列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本保障之一。

作为全省农业科研的旗舰队，山西省农科院如何顺势而为，进一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引领和驱动农民增收，为全省建设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呢？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

农业科技事业迎来新机遇

“当前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历史新阶段。”谈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定调“农业科技”这个话题，刘惠民指出，这一决策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可谓抓住了农业实现全新突破和跨越发展的关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农业科技公益性、基础性、社会性的地位。”刘惠民认为，当前

一系列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为农业科技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遇。

刘惠民说，山西省农科院将把握机遇，扎实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科研成果的示范推广；组织农科专家走出大院、走向基层，以成果示范穿针引线，引领和支撑全省现代农业发展。

应加强种业科技创新

种子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种子产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决定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山西省农科院要在新品种选育、推动全省种业整体升级中，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作用。”刘惠民表示，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一直是山西省农科院科研工作的重点。在旱地作物育种、杂粮作物育种、果菜育种和农作物转基因育种等领域居国内先进水平。

刘惠民指出，推进育种科研事业，更好地支撑山西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关键是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育种运作模式，重点是瞄准玉米、小麦等大

宗粮食作物和杂粮、果菜等特色农作物，积极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创新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创制一批改良育种材料。

商业化育种是当前国家农业科研院所普遍面临的一大“瓶颈”，但山西省农科院破解这一瓶颈有自己的妙招儿。刘惠民透露，山西省农科院近期将通过参股、控股、改制、合作等多种方式，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子骨干企业。

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是关键

“遴选、集成、配套、示范、推广”适合某一区域的稳产、高产农业新技术，是山西省农科院近年来大力实施“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项目的主要经验，更是该院主动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缩影。

目前，山西省农科院已组织3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全省80多个县(区)农村蹲点搞服务，示范推广了150多个优良品种和100多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

“让先进的农业科技最大化地与种粮大户结合、与农业企业结合、与农业专业合作社结



合、与示范园区结合；让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化地得以充分发挥，让示范样板引领农业转型；让科技成为农民增收和山西现代农业建设的强力助力器，我们会乐此不疲，不断地努力。”

刘惠民期待推出更好的农业科技成果和技术，为农业的转型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